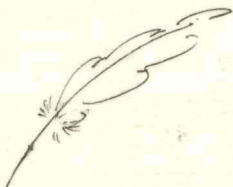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莎士比亚绎读

刘小枫 甘 阳 ● 主编



[美]阿鲁里斯/苏利文 ● 编

莎士比亚的政治盛典

——文学与政治论文集

Shakespeare's Political Pageant:
Essays i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赵 蓉 ● 译

华夏出版社



莎士比亚的政治盛典

——文学与政治论文集

Shakespeare's Political Pageant:
Essays i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美]阿鲁里斯/苏利文 | 编

赵 蓉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莎士比亚的政治盛典/ (美)阿鲁里斯, (美)苏利文编;
赵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1. 1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书名原文: Shakespeare' s Political Pageant

ISBN 978-7-5080-6036-1

I. ①莎… II. ①阿… ②苏… ③赵… III. ①莎士比亚,
W. (1564~1616) —戏剧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561.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5860 号

*Shakespeare' s Political Pageant:Essays i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Edited by Joseph Alulis and Vickie Sullivan © 1996 by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Group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6-5159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开

字 数: 283 千字

印 张: 10.5

定 价: 33.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莎士比亚绎读”出版说明

据译界前辈戈宝权查考，1856年英籍传教士慕威廉翻译出版《大英国志》（上海墨海书院印行），国人首次得知西域有个名叫“舌克斯毕”的伊丽莎白皇朝文人——“莎士比亚”这个译名则最早见于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中国甲午战败之后不久，英籍传教士艾约瑟编译的《西学略述》（1896年，上海著易堂书局版）详细介绍了莎士比亚——其时，中国已经面临巨大的改制压力。清末新政时期，林纾与魏易合译的莎士比亚故事集《英国诗人吟边燕语》出版（1904，收入“说部丛书”第一集）——其时，我国关切政制变革的志士仁人正激烈争议君主制与共和制的优劣；革命党人推翻帝制行民主共和之后不久，初版的《辞源》（1915）已列入“莎士比”词条；随后不久，林纾出版了以文言小说体翻译的莎剧四卷（1916）……“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翻译莎剧成为我国新派文人的最爱，1930年，经胡适之倡议，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辑委员会成立“莎剧全集翻译会”……据统计，自三十年代以来，莎士比亚在汉译西方文学经典中一直位居榜首，有的剧作译本达近百种之多——第二共和前期（1949-1960）出版的译本已达44种，总印数44万余册。

不过，我国学界对莎士比亚的认识基本上还停留在“绝世名优，长于诗词”的层次，距离林纾所谓莎翁“立义遣辞往往托象于神怪”的看法相去并不太远。莎士比亚不仅是最伟大的英语诗人，也是西方思想大传统中伟大的政治哲人之一。在西方文教传统谱系中，不断有学人将莎士比亚与柏拉图并举：莎士比亚戏剧以历史舞台为背

2 莎士比亚的政治盛典

景，深涉人世政治问题的底蕴，尤其是王者问题，一再激发后人掂量人性和人世的幽微，为后世探究何谓优良政制、审慎思考政制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不仅如此，与柏拉图的戏剧作品一样，作为政治哲人的莎士比亚没有学说，他的政治哲学思考无不隐含在其笔下的戏剧人物和戏剧谋篇之中。百年来，我们一直在经历前所未有的从帝制到民主共和的政制转变，却鲜有人看到，莎剧为我们提供了一笔巨大的政治哲学财富。晚近三十年，我们的莎剧全译本有了令人欣喜的臻进，但我们对莎剧的政治哲学理解仍然没有起步。

西方学界对莎剧的政治哲学解读很多，绝非无书可译。“莎士比亚绎读”系列或采译西人专著和相关文集，或委托青年才俊编译专题文萃，以期增进汉语学界对莎剧的政治哲学品质的认识。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甲组

2010年6月

前 言

文学作品借助极个性化的人物描写手段——一般政论文难以做到——揭示政治对个体生命的直接影响。在表现这种影响时，文学触及了政治最本质的一面：个体为达到自己和共同的目的而结合的手段。文学表现政治影响其人物生活的方式，以此鼓励读者去思考权利分配对共同体的善和个体的善所产生的影响。本书的各位撰稿人虽来自哲学、文学、政治学等不同领域，但他们都坚信文学研究有助于人们理解政治。^①

他们还一致认为，莎士比亚最有效地为我们展示了万花筒般的政治景观。他丰富的经典著作展现了君主制与共和制、暴君与国王、思想家与战士、基督徒与异教徒。通过对如此壮观的政治盛典极富诗意的表现，莎士比亚促使我们去思考维持不同政体的必要条件和推翻不完美政体的可行性。此外，莎士比亚的戏剧还引发了更广泛的政治问题，如宗教对政权的影响和政权对戏剧人物的影响。^② 在提

① 参 Catherine Zuckert, 《小说作为一种美国政治思想形式》(“The Novel as a Form of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载 *Reading Political Stories: Representations of Politics in Novels and Pictures*, Maureen Whitebrook 编,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1992, 页 167-204。

② 参 Allan Bloom 和 Harry Jaffa, 《莎士比亚的政治》(*Shakespeare's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页 11; 比较 Harry Jaffa, 《对莎士比亚世界的一种解释》(“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Shakespearean Universe”), 见 *Shakespeare as political Thinker*, John Alvis 和 Thomas G. West 编, Durham, N. C.: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1981), 页 290-291, 302-303。

出这些问题时，莎士比亚对政治的描绘激发我们去反思人性的本质，以及人类在整个宇宙中的位置等哲学问题。因此，从一种重要的意义上讲，莎士比亚的思考超越了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仅仅从英国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中产生的思考。^① [viii]

本书撰稿人把莎士比亚看作阐明这些永久性人类问题的引导，因此他们对莎士比亚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解必然不同于突出的新历史主义观或文化唯物主义观，虽然后者也把莎士比亚当作一位政治思想家。根据多利莫尔（Jonathan Dollimore）的观点，文化唯物主义者不相信文学拥有任何“特权”；他们认为，文学与所有其他的人类活动一样，也受到时代力量的限制。^② 与形成本书这些论文的理解相对照的是，文化唯物主义者坚持认为，所有政治问题都应被严格理解为具体时间和具体地点的物质力量方面的问题。

本书撰稿人采用的方法，也必然不同于把莎士比亚视为一位政治思想家的更早期的观点。他们不想把莎士比亚的任何一个戏剧人物看作莎士比亚本人政治观^③的代言人。他们试图研究，莎士比亚的

① 比较 Mera J. Flaumenhaft, 《市民景观：戏剧与共同体论文集》（*The Civic Spectacle: Essays on Drama and Communit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1994），页 5，

他们（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马基雅维利以及莎士比亚）都是永恒的。这不是因为他们在某方面能够被引用，而是因为他们能感动我们，使我们难以平静，使我们更加努力地反思自我：我们是谁，我们应该做什么。

关于莎士比亚对罗马的理解，可参 Paul A. Cantor 的讨论，《莎士比亚的罗马：共和国与帝国》（*Shakespeare's Rome: Republic and Empir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页 7-8。

② Jonathan Dollimore 和 Alan Sinfield 编，《政治的莎士比亚》（*Political Shakespeare*, 2nd e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页 4。

③ 这种方法被一个评论家概括为“糟糕的提利亚德式老习惯（Tillyardian habit）”。这种习惯赋予具体的戏剧人物和对白一种超乎戏剧的意义。它与剧本或剧作家的“真实”想法相同；而且，通常也与这位评论家的想法相同”，引自 Graham Bradshaw 的《误译：莎士比亚与唯物主义者》（*Misrepresentations: Shakespeare and the Materialist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页 9。

声音如何从那种必然构成人物冲突与矛盾的戏剧结构中传达出来。他们各抒己见，各持不同关注，以各自的方式宣布，若研究之前就假定一个伟大作家可能会写什么或想什么，那样做未免草率；而且，他们的论文还坚持认为，要想获得知识——如果可以获得的话，就需要最大限度地关注这位诗人的语言和戏剧的细节。于是，这些论文把莎士比亚当作一位研究政治的深刻思想家，每篇都致力完成一个更伟大的任务：从整体上评价莎士比亚政治思想的特点。

致 谢

感谢 Skidmore College 教职员发展委员会慷慨资助本稿，并感谢 Christine Delucia 在本稿准备阶段提供宝贵的技术支持。

目 录

前言	1
致谢	4

第一部分 喜 剧

一、新美狄亚：《威尼斯商人》中鲍西娅的喜剧性胜利	3
二、父与子：《皆大欢喜》中的问题、快乐和忧郁	45
三、智慧与法律：《一报还一报》中的政治哲学	73
四、《仲夏夜之梦》中的雅典印象	89

第二部分 历史剧

五、回家：《约翰王》中的政治解决	105
六、《亨利四世》第一、二部：哈利王子的教育问题	118
七、表演家：马基雅维利的“表象君主”亨利五世	145

第三部分 悲 剧

八、“这就是威尼斯”：《奥赛罗》的政治性	179
九、《李尔王》：智慧与权力的悲剧性分裂	216

2 莎士比亚的政治盛典

十、《麦克白》中的思与行	237
十一、《麦克白》中的勇气与无能	248
十二、“与自己交战”：莎士比亚的罗马英雄与 共和国传统	269
索引	298
撰稿人介绍	320

第一部分 喜 剧

一、新美狄亚：《威尼斯商人》中 鲍西娅的喜剧性胜利*

朱克特

[3] 可能是因为情节构思巧妙，人物个性鲜明，并且充满美丽的诗意时刻，《威尼斯商人》始终是观众面最广、上演率最高、讨论最多的莎剧之一。同时，《威尼斯商人》也是最麻烦的莎剧之一。形式上，《威尼斯商人》展示的一系列情节很难构成一个连贯而统一的整体。^① 实质上，它表现了一个明显具有反犹太主义陋习

* 感谢 Joe Alulis、Vickie Sullivan、Ruth Weiner、Catherine Zucker 和 Rachel Zuckert，他们对本文形成初稿提供了良好的建议。也感谢 Barbara Tovey，她的一篇关于《威尼斯商人》的优秀论文使我受益匪浅（见后文注释）。本文引用的莎士比亚戏剧的原文均出自 Kenneth Myrick 编辑的《印版经典莎士比亚全集》（the Signet editio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65）。[译按] 本书中出现的莎士比亚作品的汉译，主要参《莎士比亚戏剧集》，朱生豪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年。为行文方便，略有改动。

① 参 David N. Beauregard, 《锡德尼、亚里士多德与〈威尼斯商人〉：莎士比亚的自由和正义三合一形象》（“Sidney, Aristotle, and *The merchant of Venice*: Shakespeare's Triadic Image of Liberty and Justice”），载 *Shakespeare Studies* 20（1988），页 33 和 48；John Lyon, 《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 Boston: Twayne, 1988），xi, xv, 1-17, 95-96；Barbara K. Lewalski, 《〈威尼斯商人〉中的圣经典故和寓言》（“Biblical Allusion and Allegory in *The Merchant of Venice*”），载 *Shakespeare Quarterly* 13（1962），页 328；Joan Ozark Holmer, 《智慧地爱与匣子考验：〈威尼斯商人〉中象征的统一性和结构的统一性》（“Loving Wisely and the Casket Test: Symbolic and Structural Unity in *The Merchant of Venice*”），载 *Shakespeare Studies* II（1978），页 53；Herbert S. Donow, 《莎士比亚的匣子：〈威尼斯商人〉中的统一性》（“Shakespeare's Caskets: Unity in *The Merchant of Venice*”），载 *Shakespeare Studies* 4（1968），页 86。

4 莎士比亚的政治盛典

(anti-Semitism) 的基督教社会。莎士比亚本人显然比自己笔下的威尼斯人眼光更高远, 尽管如此, 就其对犹太人的刻画来看, 莎士比亚似乎跟那些信仰基督教的威尼斯人一样, 带有令人讨厌的根深蒂固的偏见。而且, 在该剧提供的喜剧性解决方案中, 要“妥善解决”所有推动情节发展的分裂, 就必须迫使夏洛克(Shylock)成为基督徒, 迫使夏洛克的女儿杰西卡(Jessica)弃父背祖。杰西卡的转变固然自觉自愿, 但她的转变似乎与夏洛克的被迫转变具有同样的意义: 犹太人和犹太教不配得到基督徒的尊敬。^①

关注夏洛克并非仅出于我们的后屠犹情感, 这似乎更是该剧一开始就被接受的一部分。^② 也许是异域的诱惑, 或许是对一个似乎遭受苦难最深、表达[4]情感最强烈最复杂的剧中人物的一种反应; 不过, 从某些方面看, 这种关注让人困惑, 因为该剧标题表明, 我们应该关注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Antonio), 而不是夏洛克。如果我们关注夏洛克, 该剧在形式方面就让人困惑。如果该剧围绕夏洛克和一份关于一磅肉的契约展开, 那么法庭上的鲍西娅(Portia)和匣子考验这两个情节就显得多余, 至少与该剧主要情节难以相互关联。^③

如果遵循莎士比亚的暗示, 我们就会明白, 对夏洛克的关注很

① 关于《威尼斯商人》作为“莎士比亚最著名的问题剧”及其“被多数正常人当作唯一一部不适合观看或者阅读的莎剧”, 可参 Lawrence Danson, 《〈威尼斯商人〉的和谐》(*The Harmonies of The Merchant of Veni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页 2-3; 亦参 Derek Cohen, 《莎士比亚的动机》(*Shakespeare's Motives*, London: Macmillan, 1988), 页 104-118; Lewalski, 《〈威尼斯商人〉中的圣经典故和寓言》, 前揭, 页 333-334; Lynda E. Boose, 《喜剧的契约和鲍西娅的金戒指》(“The Comic Contract and Portia's Golden Ring”), 载 *Shakespeare Studies* 20 (1988), 页 241。

② 关于舞台历史和夏洛克在其中的作用, 参 Lyon, 《威尼斯商人》, 前揭, xiv-xvi, 通常 43; 关于夏洛克是“剧中被讨论最多、最有分量的人物形象”, 参 Marion D. Perret, 《莎士比亚笔下的犹太人: 成见和表现》(“Shakespeare's Jew: Preconception and Performance”), 页 106, 载 *Shakespeare Studies* 20 (1988), 页 263-264。

③ 可参 Harley Granville-Barker, 《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 见 *Prefaces to Shakespea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7, ii), 页 89, 91。

大程度上是错的，对该剧形式统一性的困惑也是错的。实际上，该剧在情节安排上可谓天衣无缝。一旦把握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更深入理解该剧真正的干扰因素。莎士比亚通常是在开始几场戏里就设置好了主要情节试图解决的问题。^① 这里的问题是，安东尼奥和鲍西娅都爱恋巴萨尼奥（Bassanio），两人是竞争巴萨尼奥之爱的对手。该剧表现了安东尼奥和鲍西娅的竞争。赢家当然是鲍西娅，如果仅从该剧标题判断，失败者的某些方面就需要我们特别关注。剧中几个主要事件都是围绕安东尼奥与鲍西娅的竞争展开。鲍西娅在如下三阶段都战胜了安东尼奥：首先是金匣子情节，鲍西娅帮助巴萨尼奥选对了匣子，使他“赢得了”自己，或者说她赢得了巴萨尼奥；接着是安东尼奥一案，鲍西娅打败夏洛克，救出安东尼奥，从而也使巴萨尼奥摆脱了他在安东尼奥那里欠下的无尽的债务；如果安东尼奥在这个案子里败给夏洛克，那么安东尼奥就打败了鲍西娅；^② 最后是戒指插曲，鲍西娅再次取胜，这也是她第三次取胜，也是最后一次取胜，并且彻底打败了安东尼奥。^③ 这就是《威尼斯商人》要讲的故事；它当然也讲了夏洛克的故事和杰西卡私奔的故事，所有其他故事都必须在这个故事当中找到一席之地，而且必须是在这个故事当中。^④

通过采用一种适合该剧主要定位的经济原则，莎士比亚很快就在第一、二场各自开始的几行里设置好《威尼斯商人》的问题，尽

① 对照 Lyon, 《威尼斯商人》，前揭，页 31。

② 参 Barbara Tovey, 《金匣子：关于〈威尼斯商人〉的一种解释》（“The Golden Casket,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rchant of Venice*”），见 *Shakespeare as Political Thinker*, ed. John Alvis and Thomas West Durham, N. C. :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1981, 页 228; Donow, 《莎士比亚的匣子：〈威尼斯商人〉的统一性》，前揭，页 87。

③ 因此，Lyon 完全弄错了。他认为，戒指事件表现了“另一个独立的情节，只在最后一幕才得到充分的发展”（《威尼斯商人》，前揭，页 117）；他把这个事件叫做“离题的戒指情节”（《威尼斯商人》，前揭，页 118）。

④ 关于这种结构，迄今为止最清楚的分析，可参 Lawrence Hyman, 《〈威尼斯商人〉中的情敌们》（“The Rival Lovers in *The Merchant of Venice*”），载 *Shakespeare Quarterly* 21 (1970), 页 109 - 110。

管问题设置得还不够明显。安东尼奥是威尼斯商人，因而也是商业城市威尼斯的核心人物；面对这个问题，安东尼奥的回答开门见山：“真的，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闷闷不乐。”（《威尼斯商人》，I.i.1）“美丽山峦”那边美丽的女主人鲍西娅，在一开始回答这个问题时与安东尼奥惊人地相似：“真的，尼莉莎，我这小小的身体[5]已经厌倦了这广阔的世界。”（I.ii.1-2）威尼斯和贝尔蒙特这两个剧中世界可谓天壤之别，然而，身处这两个不同世界的两位主人公竟被同样深沉的忧愁困扰。

他们一开始的忧愁启动了最初两场戏的主要情节：寻找各自忧愁的缘由。安东尼奥的忧愁新近刚产生，并非与生俱有。萨莱尼奥（Solanio）刚刚问到这一点，甚至抱怨这样的忧愁。安东尼奥告诉我们：“你们说见我这样忧愁，你们也心烦。”（I.i.2）^①之后不久，葛莱西安诺（Gratiano）对安东尼奥说：“相信我，你完全变了。”（I.i.76）他的话更加深了我们的这个印象：安东尼奥突然被忧伤攫住了。

安东尼奥的忧伤突如其来又神秘莫测。对于这样的忧伤，安东尼奥坦承自己如此“愚笨”，竟说不清“是怎样让忧愁沾上身的”。他这样总结道：“我简直有些不了解自己。”（I.i.3-7）然而，凭着对自己的了解，安东尼奥还是断然否定了朋友的说法：他的忧愁源自对商业冒险的焦虑。在充满风险的威尼斯城，这也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心态。^②安东尼奥就像空中的飞鸟、水中的百合，不会为俗事焦虑心烦；

① 对照 Allan Bloom, 《莎士比亚的政治》，前揭，页 19。Bloom 说：“安东尼奥很悲伤，对他来说，生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信仰基督教。”另一方面，Danson 把安东尼奥的悲伤与安东尼奥对待夏洛克的道德失败联系起来。Bloom 和 Danson 都没有解释，为什么安东尼奥会突然感到悲哀？（对照 Danson, 《莎士比亚的匣子：〈威尼斯商人〉的统一性》，前揭，页 32）；也可对照 Thomas Fujimara, 《〈威尼斯商人〉的模式与结构》（“Mode and Structure in *The Merchant of Venice*”, *PMLA* 81（1966），页 509。

② 比较 Lars Engle, 《节俭就是幸福：〈威尼斯商人〉中的交易与解释》（“Thrift Is Blessing: Exchange and Explanation in *The Merchant of Venice*”），载 *Shakespearean Quarterly* 37（1986），页 21-22；Allan Haladay, 《安东尼奥与救赎寓言》（“Antonio and the Allegory of Salvation”），载 *Shakespeare Studies* 4（1968），页 111。